

十九世紀英國史

郭 榮 趙

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

十九世紀英國史

A HISTORY OF ENGLAND

1815-1914

郭 榮 趙

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

1973

十九世紀英國史

A HISTORY OF ENGLAND

1815-1914

著者：郭榮趙

出版者：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

臺灣陽明山21號信箱

印刷者：臺北監獄印刷廠

桃園·龜山

實價：新臺幣 25 元

郵政劃撥帳戶 15629 號

戶名：新聞紀要與新聞索引社

初版：中華民國62年（1973）

內政部內版臺業字第1767號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十九世紀英國史

目 錄

第一章	戰後的英國·····	3
第二章	財富的增加·····	14
第三章	英格蘭的問題·····	28
第四章	邁向民主的運動·····	45
第五章	政府機關·····	67
第六章	外交政策 1815-1865·····	81
第七章	六十年代的思想·····	95
第八章	新國家 1868-1900·····	109
第九章	外交和殖民政策 1868-1902·····	127
第十章	武裝和平·····	144
	重要人名索引和譯名對照表·····	170
	法案索引·····	173
	重要事物索引·····	174

前言

本書的時間，起於一八一五，止於一九一四。因爲在這一百年之間，英國歷史發生過很重要的變化；在政治上邁向了民主；在經濟上變成了巨富；在殖民事業上形成了世界帝國；在思想上產生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。所以，無論從那一方面看，對世界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本書的取材，主要根據：Sir James Butler 的 *A History of England*，牛津大學出版。原書的好處在能把握這個時期的歷史主流，但有若干歷史事實，却過份的簡略；對沒有英國史修養的人，即使在英國土生土長，恐怕不容易看懂。我取原書的優點，並作必要的補充。

我不敢說本書的出版有何貢獻；更不敢說本書的編著有何動機。一九七〇年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，也是中國最有希望的時代。知識份子的苦悶可想而知。如果說有何動機的話，我只能說借此自我解悶而已。

郭榮趙 1973年 台灣 士林

十九世紀英國史

目 錄

第一章	戰後的英國·····	3
第二章	財富的增加·····	14
第三章	英格蘭的問題·····	28
第四章	邁向民主的運動·····	45
第五章	政府機關·····	67
第六章	外交政策 1815-1865·····	81
第七章	六十年代的思想·····	95
第八章	新國家 1868-1900·····	109
第九章	外交和殖民政策 1868-1902·····	127
第十章	武裝和平·····	144
	重要人名索引和譯名對照表·····	170
	法案索引·····	173
	重要事物索引·····	174

第一章 戰後的英國

從1815拿破崙戰爭的結束，到1914的歐戰，這是英國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時期。對英國外觀的改變，遠超過以前任何一個時期。城市的升起，道路的改良，人口的增加。在在都可以證明。在北部，第一次成為人口的集中地。有錢的人，大量地運用資本，運用科學知識，不僅使自己獲利，而且也使大眾方便。機器的使用，促進了進一步的分工與專業；因此，改變了人民的工作和悠閑的情況。火車、腳踏車、摩托車，加速了人們往來的機動性。廉價的教育、報紙和郵費，溝通了人們的心靈。自然科學的發展，對人對宇宙提出了新的看法；而把科學方法，引用到思想的領域。由於受到科學的鼓勵，宗教雖然與唯物主義妥協；然而，還是由於科學的功勞，對神的觀念，也減少人的成份。在文學方面，英詩的火炬仍在熊熊燃燒；至於小說，發展達到最高的境界，解釋人類的心靈。在政治上，政府制度已更具體有效；由於工人的集中，團結容易，於是，政治權力也就從地主貴族的手中，轉移到政黨手裡，它們大部份是由成年男子所組成。至於在海外，殖民地紛紛建立；在亞洲、中非和南海一帶，英國得到許多土地。

在此時期，英國歷史受到三個運動的影響：

一爲宗教運動，一爲經濟運動，一爲政治運動。三者之中，宗教運動並不顯著，然其重要却不能忽視。因爲在這樣一個大的轉變時代，它給人思想和慰藉，忍受轉變所帶來的苦難，而不失望。其次、工業革命急劇地改變人們生活的外在環境，他們對社會的看法，和他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。至於法國革命，雖然像旋風一般，在一夜之間，吹垮了舊日社會的結構，摧毀了往日的人的價值觀念；然而就對英國的影響而言，也許比上述兩個運動還小。不過，它是突如其來，它顯示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；它解放了無窮的知識力量。尤其，它是與持續二十多年的拿破崙戰爭相連，而使英國與歐陸截斷。因此，加強了工業革命的影響。

無疑的，在政治方面，或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，從滑鐵盧（waterloo）到曼斯（Mons）的陷落，可以很自然地分成兩半，而以1860年代作爲分水嶺。在內政方面，帕馬斯通時代（Palmerstonian epoch）的結束，和城市工人選舉權的取得，這是和國家功用新理論的興起，不謀而合的。在外交方面，由於普魯士的興起，和大西洋兩岸恐怖戰爭的進行，使英國不能不予以特別地注意。所以在這本小書中，爲方便計，還是採用這樣的分法。不過，由於一九一四年的歐戰乃是十九世紀的收場。因此，對於拿破崙戰爭以後的

幾年，最好也把它列作一個單元、予以處理。

一八一五的英國，隨着觀點的不同，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對研究國際政治的人，英國實力雄厚，聲望極高。的確，在戰爭中，法軍并未邁向倫敦街頭；相反地，她還取得馬爾他、錫蘭、好望角。她是海上的霸權，有十年的時間，她的艦隊，超過全歐洲其他國家艦隊的總合。雖然，有的工業受損，但其他的工業却獲利不少。設非有英國雄厚資本的支持，其他的盟邦對付法國也許毫無辦法。在拿破崙戰爭最後一段時期，英國的軍隊派到西班牙，和佛朗多（Flanders）擔負重要的任務。在外交方面，英國所擔任的角色更為重要。要知道，那是英國的政治家卡索內夫（Castlereagh）才能使對法作戰的盟邦，團結一起；那也是英國的威靈頓將軍，領導聯軍，成功地佔領法國。尤其，在人道方面，英國也居於各國的領導地位。她本身廢除了奴隸的買賣，她也努力促成他國作同樣的廢除。

在內政方面，英國給外人的印象也好。在所有西歐國家之中，只有英國的憲法經得起革命的風霜。國王受人民愛戴。地主、農人、銀行家、投資者，人人發財。在各類新工業方面，獲利也大。

不過，在這種冠冕堂皇的外表後面，英國的社會結構，也發生很深的裂痕；甚至腐朽不堪。

在統治階級中，公私道德的標準，一般都是墮落。政府和教會職位的任命，並不依照能力，而是當作恩惠賞賜。許多教區的牧師，忽視職責，很少照顧自己教區的人民。對於既得利益，則過份的尊重。由於重視財產，使很多惡政無法改革，刑法殘酷。爲了保護自己的森林，地主可以使用跳槍；而竊盜的處分，不是死刑也要驅逐出境。或許有人說：英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，全國只有一個共同的法律。然而實際上，對窮人而言，自由對他們沒有意義。法律只是維護財產，這對有產與無產者而言，就有很大的區別。即使窮人可以引用有利自己的法律；但是沒有錢，則仍舊不能使法律生效。

很不幸，而工農業當時所作的改變，又對窮人非常不利，使得他們的生活更不安全。在鄉間，那些自給自足的村莊，由於仍舊運用不經濟的方法，已經日趨凋謝；成千成萬的勞動者，生活非常可憐。至於在城市，工廠林立，烏烟滿天，無產業的人日益增多，終日工作，難得一飽。既無組織，又未受教育；他們對廠主毫無應付辦法。因爲，在這個時代的思想，乃是反對國家干涉，而讓新工業的衝力任意發展，不加約束。

新的情勢，削弱了階級之間的同情。以前，地主貴族瞭解鄉間的人們。但是現在，情形變了。雖然，英國仍是以農業爲主，但是，過去四十

年的變化，已經使許多老的個人關係結束。在城市中，友誼的傳統本來很少。上流人士和富有的中產階級，他們那瞭解貧民區中居民的感受。由於瞭解少，恐懼也就深。統治階級認為貧民本來就是被統治者。他們的貧窮與無知，可能和法國一樣，會引發暴力革命；他們極不願意讓窮人有閑學習；有權結合，來改善他們的生活。

這些根深蒂固的罪惡，由於從戰爭轉向和平，再加上英國的氣候的影響；因之益形嚴重。然而，對於這些危機，政府完全無能應付；也許沒有一個政府能够應付。但是更糟的是政府和國會把事情弄得更壞。因之，隨着和平而來的，在英國乃是六個可怕不幸的年頭：充滿了苦難、仇恨、飢餓、流血和恥辱。這是一個壓制內戰的時代。然而，幾乎是突然之間，這種緊張竟鬆弛下來。從一八二〇年代的初期開始，由於開明建設力量的抬頭，情形開始改變。到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，這種力量的衝勁也就更大；非常湊巧的，這些不幸的年頭，正巧又是英國的外交政策，在外長卡索內夫的努力之下，和歐洲各盟國密切合作的時候。這些歐洲國家，都控制在專制君主的手裡，他們利用外交的協同，來壓制國內的混亂。所以卡索內夫的政策，從英國人民看來，乃是幫助歐洲反動派達到目的；因此，更增加了英國人民對政府的敵意。如果他讓反對的人士瞭解，他的

政策原來是盡力反對神聖同盟諸國的陰謀；則對政府敵對的程度，或許可以減少。

從法國作戰歸來的士兵，發現國內食物昂貴，征稅很高，工資又低，工作也少。好不容易等到罷戰歸來，然而所面對的現實，比以前更壞。所以英國不得不改變制度和方式，來適應新的經濟情況。

在這些年中，小麥價格的狂變，是其中主要的問題之一。在1813年8月，一夸脫（Quarter）的價格是112先令；到1816年1月，降到52先令6便士；六月，又升到117先令。由於怕麥價失去戰時的價格，1815年在地主們的控制之下，國會通過了谷物法（Corn Law），規定麥價一夸脫在80先令以下的時候，禁止小麥進口。此項措施，並沒有把他們從不景氣的期間，拯救出來。但是，却足以使貧民和工業階級氣憤，他們抱怨國會仍在進行戰時措施的延長。貧窮救濟的數字也急劇增加，在1815年只有550萬磅，可是到1818年，就達到800萬磅。這顯示要多麼大的一筆經費，才能使人民免於飢餓之苦。

除了食物價格以外，城市中的工業人民，也有苦處。商業界的新亨，他們希望賺錢，但卻沒有明確的方向。他們為投機的市場而生產，但通常都作了錯誤的估計。當時信用制度不足；發財虧本，變化無常。自然，最苦的還是貧民。戰

爭結束，政府對衣服，鐵和鋼的訂單突然減少；歐洲大陸主顧如此之窮，無力購買英國產品，。對此製造業者并未預見，事實上，英國的進出口減少了。貿易的不景氣帶來普遍的失業，工資的削減。再加上退伍的士兵，使情形更加惡劣。

谷物法案通過的時候，抗議以暴亂的形式出現；此乃理有固然。1816年的飢荒，在某些鄉間已發生了暴力的行動，大家都反對現存的情況；罷工的事件也層出不窮，破壞工廠。爲了嚇阻，十人被處死刑。1817年，發生了企圖謀殺攝政的事件；三月間，一羣貧困的紡紗者從曼徹斯特（**Manchester**）出發，準備遞呈請願書，政府用軍隊來解散；入夏，又有兩次暴亂遭受壓制，結果兩人絞死，十一人終身放逐。

上述事件，自然具有意義；但是，更具有意義的，乃是工人階級政治興趣的提高。由於少數人的鼓動，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領導者，就是威廉柯柏特（**William Cobbett**）。對於國會改革的要求和民主的選舉，再度提出。羣衆集會到處舉行，組織也建立起來。柯柏特的政治紀錄（**Political Register**），就成爲激進新聞的先鋒，其銷售達到四萬到五萬份。柯柏特鼓動他的讀者，集中火力，要求國會改革。所有政府的貪污、高稅、物價高漲，國會都要負責。工人階級一定要控制國會，恢復英國工業發達以前的黃金時代。這些

改革派的要求，在邊沁（ Jeremy Bentham ）的弟子中，得到支持。

對國會議員和一般四十歲以上的人而言，他們看到1816年到1817年的那些情形，無疑地會想到在英國可能發生法國那樣的革命。法王路易十六（ Louis xvi ）的送上斷頭臺，和九月的大屠殺，距當時不過二十五年。血光閃閃，這些恐怖，發動之初完全是純潔的。因此，在拿破崙戰爭時期，批評政府的人被認為是雅各賓分子（ Jacobin ）；在蘇格蘭，有人因為主張改革國會，就被送到波坦尼灣去（ Botany Bay ）。現在，戰爭完了；然而，只不過剛剛才完；戰爭的困擾，仍舊縈迴人心。法國革命，對歐陸的政治，對英國文學，不管它帶來甚麼好處，對英國的政治而言，它的影響乃是完全不利的，這些惡劣的影響，至少達三十年之久。面對着暴動，財產的破壞和抗議的集會，利物浦（ Liverpool ）的政府，沒有公正的情報，沒有可靠的警察，只有停止人身保護狀，禁止破壞性的集會。很快的，連公開集會都予禁止，甚至於劍橋大學學生聯會也停止辯論。政府終於獲得了勝利，部份的原因是豐收，所以1818年得以平靜度過。

雖然商業好轉，然而，工資并未增加。某些行業，在波折之後，雖然景氣，但也有危機。1818年年底，北部已有罷工事件的發生。次年，不滿

的風暴再度重新發作；更多抗議的集會，來勢汹汹；工人階級之中，已經有更多的政治結社產生，改革國會的要求也更多。在伯明罕(Birmingham)，一次龐大的羣衆集會，竟藐視法律，自選代表；在曼徹斯特(Manchester)，也有盛大的和平集會，結果被解散；十一位沒有武裝的羣衆被殺，幾百個受傷。這種屠殺，給反對者更深的刺激，改革運動也就愈行激烈。政府的辦法是迅速征集一萬名新兵，國會也通過一批新的壓制性的法律，其中有的是臨時性的，有的則是永久性的。雖然國會中也遭受到強烈的反對，但是攜帶武器，公共集會，和出版的自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。1819這一年，英國政治詞彙中，增加好些新的名詞，如：彼得盧屠殺(Peterloo)、六法案(Six Acts)、和自由分子，激進分子等等。

事實上，當時的英國，正如甫勒斯(Francis Place)的看法，已經瀕臨內戰的邊緣；他是一位很好的法官。1820年是新的一年，也是新國王上臺的開始。這一年一月，喬治第三死了，然而，氣氛很壞。暗殺整個內閣的陰謀也被發現。西班牙的革命，給改革者新的刺激，又發生好幾次暴亂，但都不成功。可是，突然之間，一項私人的悲傷事件，轉變了歷史的方向。喬治第四(George IV)即位以後，他和夫人之間的爭執日趨嚴重。在英國歷史上，從亨利第八和他的女兒那

個時代以來，沒有一樁婚姻的事務，曾對英國的歷史，發生這麼大的影響。卡洛林（**Caroline**）皇后的是非，國王夫婦的品格，成爲舉國上下談論的主題。國會中的反對黨，不分在內在外，都利用人民仇恨丈夫和同情妻子的這種情緒，君主的地位在國人心中，從來沒有降低到這步田地，但是它的直接的影響乃是平息了社會危機。當這種情緒低潮的時候，物價降低，食物便宜，貿易上升。然而行政部門的聲望，却嚴重的動搖，很顯然「人民和國會之間的休戰」，會很快導致政治的改革。新政府中，比耳（**Peel**）任內長，康寧（**Canning**）接外長；哈金遜（**Huskisson**）任貿易局主席（**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**）。這些人，都是托雷黨（**Tory**）中的開明分子，同情時代的精神。事實上，他們開創了自由政府的一個新時代；最後，把繁榮慢慢帶回英國，使過去的那些惡劣的年頭，成爲人們記憶中的噩夢。從今日看來，這種記憶在雪萊（**Shelley**）和拜倫（**Byron**）的作品中，仍舊可以看出。他們兩人，前者那麼純真，而後者對壓制如此的仇恨。不過，爲了使我們不要失去平衡，讓我記住還有施葛特（**Scott**）和奧斯汀（**Jean Austen**）；那些舒適的小說，也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出現。就在一八一九年發生彼特盧屠殺事件的這一年，也產生了濟慈的夜鶯賦（**Odes to**

a Nightingale) 和吊一座希臘人的墳墓 (On a Grecian Urn) 那樣的作品。